

「流動」於高地間：

中央王朝邊政影響下滇西南花傣僳的遷徙與分佈 (1735-1911)*

鍾鷺藝

廈門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系

滇西南花傣僳的遷徙與分佈可謂是深受清乾隆以降，中央王朝籌邊之道的影響。在直面延伸至帝國邊陲的中央王朝時，滇西南花傣僳利用自身在中央王朝籌邊體系中身份之變化，成為其「治理資源」。而在中央王朝無力維繫自身在邊陲的治理，加之西方殖民勢力的到來，使得滇西南「多國邊地」之現實日益彰顯時，滇西南花傣僳依舊能游刃於政治經濟體系之中，「用腳來投票」，流動於東南亞北部大陸之高地，主動選擇最適宜「治理」自己的「治理者」，並最終在泰北形成現今最為西方學界所熟知的傣僳人社會文化。基於歷史文獻，個人試圖勾勒雲南傣僳人從清王朝武力經辦之對象，變身為助其經營西南邊疆之過程，及其中所揭示的清王朝自身營邊政策之變化。借助田野工作所得資料，本文也將以個案的形式呈現花傣僳對自身如何成為清王朝「治理資源」的歷史記憶，以此展現生活于滇西南這一帝國邊陲的原住族群如何建構逐步深入的帝國權力。此外將研究視野延伸至東南亞北部大陸，便可發現，十九世紀中葉起，滇西南花傣僳較大規模遷居緬甸克欽邦、撣邦，及泰國北部，以致形成現今東南亞北部大陸傣僳人分佈之局面，也與其作為清王朝的「治理資源」息息相關。

關鍵詞：花傣僳，滇西南，清王朝，邊政，歷史民族志

* 拙文之修改多受益於匿名審稿人之敬業，雖只經電郵間接溝通，但其近乎「手把手式」的指點與建議，個人如沐春風，受惠良多，對此僅致由衷之謝意。

一、前言

又西南則永昌一郡，與順甯皆界連緬甸，順寧外接木邦，內隔保夷，永昌則外接蠻莫木邦，內隔野夷。緬人不能跨保黑越野人而連內界。考野夷昔皆劃居八關以外，自乾隆三十四五年以後，始漸遷關內，孽息日眾，不可複驅。其性情亦略類保黑。但保黑一目能統數十寨，野夷則數十戶十數戶皆為一寨。有一寨即自置一長，名為「野貫」。渙無統屬，良悍不齊，悍者剽劫殘賊，不可誨諭，但知惕威，不知感德，但可雕剿，不可犁掃。先孤其掌後殄其渠。殲一懲百，能使知怯。惟其巢穴皆在酷瘴之鄉，恃以為固。霜降以前，不可輕涉，雨水以後，春瘴又興，山山可潛，路路可竄。兵盛則獸散延喘，兵旋則狼負為奸。大舉既慮虛勞，長圍又難驟合。頓兵非計，奔命損威。惟有責成守土鎮臣，假之事權，簡兵礪銳，以待狎徵。責成守土長吏，寬其籌備，募練選礮，以稔夷情，專殲盈貫。又在榮勵隴川幹崖諸土司眾效腹心，稟承調度。戎鉞之討既伸，潢蛙之氛自靖。

—《滇省夷人圖說·跋文》

成書於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的《滇省夷人圖說》為雲貴總督伯麟奉旨所編，上述跋文應出自其手。¹伯麟任職雲貴總督長達一十六年（嘉慶九年至二十五年），跋文中所指的「保黑」及「野夷」，為其經營西南邊徼

¹ 對於《滇省夷人圖說》之簡介及其跋文著者的考證，請參閱揣振宇（2009）。《滇省夷人圖說》屬清乾隆以降，中央王朝編撰的各類描繪西南邊疆原住族群的圖冊之一，此類圖冊俗稱「苗蠻圖」。基於對清朝眾多「苗蠻圖」之跋文文本的研究，Hostetler認為，在籌邊政策的描述上，嘉慶朝與乾隆朝不同，其跋文「更加注重於描述具體的邊政及如何有效使用（清王朝）自身的治理資源」（1995：84）。西南各省督撫奉旨編纂「苗蠻圖」，以供清朝皇帝加深對西南各原住族群之瞭解，並方便其制定政策，加強自身對「苗蠻圖」內所述對象之治理。基於對聖意之體察及討聖歡之考量，此類「苗蠻圖」之跋文雖是出自編纂者之手，但往往能反映出不同皇帝各自的靖邊之道。因此嘉慶朝相關跋文對「具體的邊政及如何有效使用（清王朝）自身的治理資源」之關注，也應為嘉慶帝所看重。

的主要經辦對象。在伯麟看來，相較于「俛黑」，對「野夷」的經辦顯然更為棘手，故其對滇西南「野夷」的經辦之策佔據其所撰跋文的較大篇幅，實際上伯麟對雲南全境邊防情況的描述，屬上述所引有關滇西南部分，最為詳細。²由此可知在乾隆朝「中緬之戰」後，「野夷漸遷關內」所導致的隱患及相應的解決之道為此時期雲南邊政的重點。³對於伯麟來說，經辦「野夷」在雲南邊政中屬「無前例可循」，其相應的解決之道也賦予了滇西南相較于

² 就地貌而言，雲南大致可分為滇東、滇西兩部分，後者與前者最大的區別在於，滇西分佈著幾大由北往南流向的河流，從東向西依此為瀾滄江、怒江、獨龍江、大盈江及龍川江，前兩條分別為湄公河、薩爾溫江兩大亞洲水系的上流，後三條則為亞洲另一大水系伊洛瓦底江的上流。從地理區域上來看，上述水系的存在將滇西與東南亞置於同一地理區之中。若在南北向再做劃分，可進一步將滇西劃分為「西北區的橫斷山脈水系」及「西南區的橫斷山脈水系」，後者「包括怒江下游、瀾滄江下游、龍川江及大盈江流域」，是現今雲南「擺夷」（即今傣族，清朝文獻多稱之為「擺夷」）分佈的主要地區（江應梁 2003：52），亦即Giersch（2006）所謂的「月牙形」地區。就今日的行政劃分而言，此地區包括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保山市、臨滄市、及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四地州，可謂之為廣義上的滇西南。與此不同，在本文中滇西南僅為狹義上的，指「月牙形」西半邊，即德宏州、保山市及臨滄市西部部分地區，若以流域劃分來看，此地區屬怒江下游、龍川江及大盈江流域。除了以河流的流動為依據外，個人對狹義上滇西南的劃分，還有另一重要的依據，即以商貿圈為基礎的人員、物資的流動。以雲南清末民初商貿路線的研究為基礎，McGrath（2002：50-51）將雲南劃分為三大區域：滇東、滇西及滇南，此三大區域皆存在一商貿中心（分別為昆明、大理及思茅），以維繫雲南與東南亞間的遠程貿易。其遠端貿易的維繫主要仰賴於一兩條商貿路線，滇西即商貿圈即以八莫-騰沖-保山-大理路線為主。對於「月牙形」地區而言，因此路線而形成的商貿圈主要覆蓋怒江下游、龍川江及大盈江流域，即「月牙形」西半邊。至於屬瀾滄江下游流域，以西雙版納為核心的「月牙形」東半邊，則屬滇南商貿圈。綜上所述，以流域及商貿圈為劃分依據，將滇西南視為「月牙形」地區內，一可單獨作為研究對象的地理區，應為恰當之舉。

³ 十六世紀末強勢的緬甸Toungoo王朝逐漸將勢力延伸至今緬甸北部八莫一帶，為鞏固自身的西南邊疆，萬曆年間，明王朝選擇在當時的騰越州週邊一帶設置「八關」，以致將聚居於今滇西南與緬甸北部之「擺夷」分為兩部分。此後「八關」外之「擺夷」便主要受緬甸政權影響，而「八關」內之「擺夷」聚居處則逐漸成為清王朝的「內部邊疆」。相應的掌控「八關」外地區的緬甸政權，也成為清王朝在西南邊疆的最大威脅。對於清王朝來說，不受瘴氣困擾的「擺夷」，恰可助其征戰緬甸，其將之視為「熟夷」，以便與「野夷」相區別，從而達致「以夷治夷」之目的（Sun 2000：286-7；Bello 2005）。但乾隆時期的「中緬之戰」徹底改變了滇西南的局勢。「因中緬之戰，滇西南的「擺夷」人口急劇減少。隴川地區由2000戶減少至1000戶，猛卯（今瑞麗）由1000戶驟減至85戶，蓋達由800戶減少至300戶，遮放由2000戶驟減至200戶。其中有很多人是被緬甸軍隊俘虜而走的，以猛卯為例，此地區有超2000人被緬甸軍隊俘虜而走」（Sun 2000：297）。滇西南「熟夷」大量減少的後果之一，便是「野夷」人口的大量增加。「中緬之戰」後，「擺夷」土司轄地的無序導致了「野夷」1770、1789年兩次較大規模的遷徙，從而進入「熟夷」地界，Bello（2005：306-7）視之為滇西南這一清王朝的「內部邊疆開始被侵蝕的標誌」。「野夷」開始進入「內部邊疆」可謂為「擺夷」土司助力清王朝征戰緬甸的結果，即「以夷治夷」的意外結果。如《騰越廳志》卷十七〈藝文志記〉所載：「從前野夷聚居江外，以江為限。自緬甸軍需以後，各土司因其運糧之力，不復遣回境外，聽其於附近山頭結寨居住」。

雲南其他邊疆，一較有獨到之處的邊防政策。伯麟進步延續中央王朝籌邊的「以夷治夷」之道，為經辦「野夷」，其將滇西南花僮僮視為「熟夷」，使之得以作為清王朝的「治理資源」，見載於史料中。由此在清代文獻中，僮僮人不再如雍正、乾隆年間般，被視為「化外野夷」，⁴而是屢次以「熟夷」身份，見載于嘉慶、道光時期的文獻。與此種身份變化相伴隨的是清代文獻中，僮僮人分佈區域的延伸，雍正、乾隆年間的「化外野夷」，不再局限於瀾滄江、怒江流域的維西、蘭坪、雲龍等地，而是西遷騰沖，成為嘉慶、道光時期的「熟夷」，並以此為核心，南下龍陵、鎮康，西遷德宏，擴散至整個滇西南，形成現今花僮僮在中國境內的分佈狀況。

基於歷史文獻，個人試圖勾勒雲南僮僮人從清王朝武力經辦之對象，變身為助其經營西南邊疆之過程，及其中所揭示的清王朝自身營邊政策的變化。借助田野工作所得資料，本文也將以個案的形式呈現花僮僮對自身如何成為清王朝「治理資源」的歷史記憶，以此展現生活于滇西南這一帝國邊陲（periphery）的原住族群如何建構逐步深入的帝國權力。此外將研究視野延伸至東南亞北部大陸，便可發現，十九世紀中葉起，滇西南花僮僮較大規模遷居緬甸克欽邦、撣邦，及泰國北部，以致形成現今東南亞北部大陸僮僮人分佈之局面，也與其作為清王朝的「治理資源」息息相關。

⁴ 在本文中，除因屬今行政區名稱及書名，不便更改，仍使用政治性、當代性較為鮮明的「僮僮族」外，均以僮僮，或僮僮人泛指廣義上的僮僮族群。在引用史料處，則遵循原文，以「粟粟」、「力些」、「獠獠」稱之。此外使用花僮僮特指本文主要研究對象，即分佈於滇西南的僮僮人。以語言學為劃分標準，滇西南花僮僮屬僮僮語中部方言區。據Bradley (2006: XV) 之研究，僮僮語可分為四個方言區。其中順著怒江流域由北往南，為北部、中部及南部三種方言區。從行政劃分上看，北部方言區位於雲南西北部，集中在怒江僮僮族自治州、迪慶藏族自治州維西縣及與怒江州接壤的緬甸北部（150多年前始有操此方言者往緬甸北部遷移）。中部方言區位於雲南西南部的保山市、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及緬甸撣邦（Shan State）北部、八莫、克欽邦（Kachin State）南部地區。南部方言區為泰國，緬甸抹穀（Mogok）一帶、屬撣邦的Taunggyi西南地區及Kengtung東南地區。此外有一東部方言區，操此方言者分佈在四川西南德昌、鹽邊及雲南寧蒗、武定等。

二、「徼外野賊」与「秤夏事件」

現今學界一般認為「粟栗」兩字最早見載于唐樊綽所撰之《蠻書》。⁵受唐朝、南詔及吐蕃之間戰事影響，原居於北接吐蕃地界的傣僳先民被迫遷移至滇西北（高志英 2007：118）。⁶宋元兩代，中文史料再無關於傣僳人的記載。明一代雖有文獻提及傣僳人，但多為習俗之簡介，並未有其遷徙情況之相關記載（傣僳族簡史 1983：13）。此外有明確描述傣僳人聚居之所在，皆源於與「雲龍州」相關之文獻，其中明末天啟（1620-1627）《滇志》卷三十〈羈縻志·種人〉更是斷言「力些，惟雲龍州有之」。⁷至於明朝嘉靖、萬曆年間（1521-1620），傣僳人受麗江木氏土司及西藏政權之間戰事影響，被迫翻越碧羅雪山，進入現今怒江傣僳族自治區北部之說法，實際上乃源於傣僳人的口頭傳說，並無史料或族譜資料支持（同上引：15-16）。就民國時期及建國初期學者實地踏查怒江，搜集而得的資料來看。清乾隆朝（1735-1796）之前，傣僳人應已大規模聚居在怒江以東的維西、蘭坪及雲龍一帶。至於怒江以西，則只有南部的瀘水一帶有成規模的傣僳人聚居（怒江舊志 1998：41），其應從毗鄰瀘水的雲龍搬遷而來。清乾隆、嘉慶（1735-1820）以降，瀘水一帶的傣僳人逐漸沿怒江逆流而上，由南向北擴散至今福貢、貢山二縣；同時傣僳人也從瀾滄江流域的維西、蘭坪二縣往西越過碧羅雪山，大規模進入福貢、貢山二縣（怒江舊志 1998；雲南省怒江傣僳族自治州社會概況傣僳、怒、勒墨族調查資料之一 1957），由此形成今日怒江傣僳人分佈之現狀。與唐朝時一樣，傣僳人在清乾隆年間的遷徙與分佈情況，也因戰事而得以見載於史料中。但此時期的傣僳人乃戰事的直接參與者，即清王朝的經辦對象，因此清王朝對傣僳人的「構建」，也更為詳細。借助此類史料，便可

⁵ 唐樊綽《蠻書》卷四〈名類〉載，「粟栗兩姓蠻、雷蠻、夢蠻」。

⁶ 基於語言學的分析，Bradley（2004：1-8）也指出，滇西北今屬麗江永勝縣、大理賓川縣，乃藏緬語族中彝語組（Central Ngwi or Central Loloish）語言多樣性最為彰顯之地區，而屬中彝語組之族群則以彝人、傣僳人、拉祜人為代表。八、九世紀時，滇西北今賓川縣鐘英鄉一帶很可能便為傣僳語之發源地。

⁷ 今云南學界多認為明代文獻中，「力些」即為今傣僳人（尤中 1985；高志英 2007）。

得知獮僮人在乾隆時期大致的分佈狀況，其中較為詳細者，當屬與乾隆十二年（1747）「秤戛事件」相關之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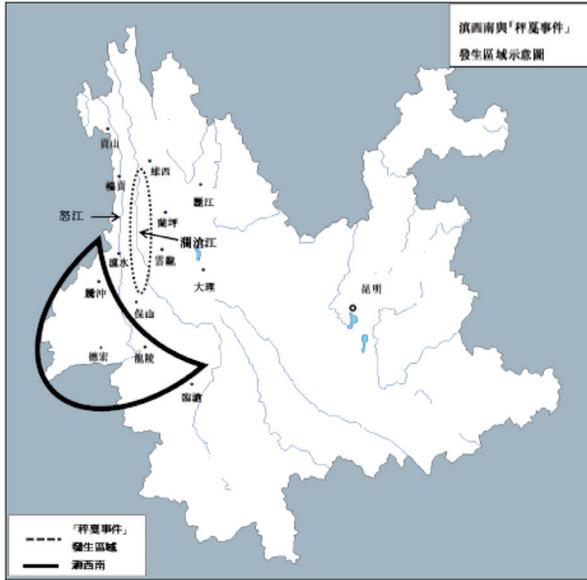


圖1 滇西南與「秤戛事件」發生區域示意圖（鍾鷺藝繪）

早在康熙年間，清王朝勢力逐漸立穩于雲南時，蘭坪一帶的「獮僮」便已成為清王朝的經辦對象，但此時清王朝主要仰賴於地方勢力。康熙三十三年（1694）曾因「漢客獮僮拘繫」，恢復在順治十六年（1659）「繳印裁州停襲」的麗江蘭州土舍（其轄地大概為今蘭坪縣），「仍設土官」。⁸此種經辦之道乃基於康熙治理西南邊疆之理念，其視「各土司為清王朝在邊疆之『臣』」，但卻將邊疆地區的原住族群與內地漢人區別對待，並不將前者視為『民』。而是希望『邊疆之臣』能先『教化』其所轄之人，使之變為可治理的、有教化的『民』」（Herman 1997: 70）。至雍正一朝（1722-1735），因清王朝在西南地區設立的「眾臣」之間戰亂頻發，已影響清王朝西南邊境的穩定。雍正轉而將生活西南邊境之人皆視為「天子之臣民」，西南各土司成

⁸ 請參閱《雲南通志稿》卷一百二十七〈秩官志〉。

為壓迫「民」的「臣」，而清王朝乃為受土司壓迫之民的拯救者（同上引：71）。由此雍正正在西南地區施行了強勢的「改土歸流」政策，清王朝勢力得以延伸至滇西北。其在麗江設置流官，並視蘭坪以北的維西為「雲南西北門戶」，佈置重兵把守。「移鶴慶府通判於維西，設維西營，駐兵一千名」，並將「舊頭目七人，給土千總銜三，土把總銜四，分治其地」。⁹清王朝在維西一帶佈防的完備，使得時任雲南總督的張允隨在應對乾隆六年（1741）維西江外「獠獠搶劫」時，能「檄調土練，將為首凶夷悉行擒斬」，並將「餘黨分散安插」。其也自信「數年以來，維西一帶邊境甚屬寧靜」乃因自身對「野夷」的「懲創」。¹⁰乾隆十一年末至十二年初（1746-1747），滇西南的知縣、客民及巡檢先後報稱「獠獠」（今保山市潞江壩一帶）強入民寨掠奪，並攔路劫掠商旅。獲報後剛升任雲貴總督的張允隨如五年前一樣應對，「飭令」、「飛飭」當地官員、土司查辦。在經辦者上報更多訊息後，張允隨制定了應對之道：

查獠獠野夷，雖具人形，實同野獸，今敢連次劫掠土司地方，而邊熟夷膽敢勾結野夷，搶掠內地村民牛只，若不大加懲創，必致擾害無休。但其地處險阻，且無一定巢穴，必須以夷攻夷，庶免勞師動眾。查潞江、遮放、芒市三土司，俱有捍衛邊隅之責，所轄夷民于江外（怒江以西）地勢情形亦俱熟悉，臣俟秋深瘴消，夷民收穫之後，行令該土司等各選精壯土練數百名，給以鳥槍火藥，臣遴委幹練將領一員，酌帶弁兵，督同前往撲剿，務使凶渠悉就擒斬，餘黨共知儆惕，不敢再肆劫掠…頑夷不法，必須懲創。¹¹

仰賴於地方官員對其應對之道施行效果的稟告，張允隨認為事態發展

⁹ 請參閱 [清] 倪崑，《設置維西、中甸兩廳事》，見載于《雲南史料叢刊》第八卷，頁489-90。

¹⁰ 請參閱《張允隨奏稿》乾隆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為奏明籌剿不法頑夷以安邊境事〉，見載于《雲南史料叢刊》第八卷，頁709-10。

¹¹ 請參閱《張允隨奏稿》乾隆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為奏明籌剿不法頑夷以安邊境事〉，見載于《雲南史料叢刊》第八卷，頁709-10。

如其所願，在沿邊土目的配合下，其得以「鋒刃未接而賊勢已孤，故一舉而稗戛阿倡、賽林、老泉等三處野賊悉就剪除」。在自信又將恢復邊境數年之寧靜後，張允隨下令撤師。但其所預想的寧靜並未到來，相反乾隆十三年（1748），規模更大的動亂隨即發生，且不再局限于偏南的保山縣一帶，而是向北延伸至維西縣。在獲報後張允隨立即「加兵征剿」，並上奏乾隆「用兵僅一千五百人，所向克捷」。在乾隆質疑這一更大規模動亂之發生乃因「汛防兵卒，遇野蠻愚弱易欺，恣意凌虐，逼以人理之所不堪，漢奸從而勾結教誘，遂致嘯聚荒筲，汛兵利其虜獲，張大其詞」時，張允隨依然相信其所獲報之內容，認為「徼外野賊」與「內地苗夷」不同，即「無兵卒欺凌，又無漢奸教誘，乃屢試不法，殺擄公行」。¹²實際上「稗戛事件」在最初平定之後，又突然的擴大化可能真如乾隆所料，張泓所著之《滇南新語》對此便有不同的描述：

祝長腿者，其（稗戛野人）首也。偶野人渡江至保山縣境買牛還，遇汛兵，疑為盜，阻留盤詰，即殺兵遁歸。縣差追緝，長腿挺身拒捕，差複斃。保令會同永昌鎮通詳請剿。（張泓 1985：25-26）

祝長腿，即張允隨徵兵加剿所欲剿捕之首犯「祝老四」。張泓奉張允隨之令派送軍糧，如方國瑜先生（1998a：776）所言，是「在事出力」者，其對「稗戛事件」之描述，乃是「記其經歷」。此外面對乾隆對其「率意用兵」的懷疑，張允隨也是自信「若不示以懲創，恐野賊以為兵威所不能加，愈無顧忌，邊徼夷民將無安寧」，並且「（自）料野賊計倆，斷不致難以收拾」。其所謂「卒將賊首祝老四擒斬解獻」的「投誠頭人夷目」，¹³在張泓（1985：25-26）的描述中，實為「土官」。在八百名綠營官兵「初夏進剿，孟秋甫奏凱，雖有斬獲…祝長腿終未成擒，後用土官率土兵進，始伏誅」，

¹² 請參閱《張允隨奏稿》乾隆十三年閏七月三十日〈為欽遵聖訊，恭摺奏複事〉，見載于《雲南史料叢刊》第八卷，頁737-9。

¹³ 請參閱《張允隨奏稿》乾隆十三年閏七月三十日〈為欽遵聖訊，恭摺奏複事〉，見載于《雲南史料叢刊》第八卷，頁737-9。

之後統兵將領「謝遊擊用二百金購其首以獻捷」，在「購得賊首」後，「秤戛之亂」終告平息。是年年末張允隨遵行乾隆對雲貴總督「於政務暇時，時一巡閱」之聖諭（馬亞輝 2012：153），赴滇西巡閱。其將滇西北視為巡閱重點，但因覺「道路迂繞」，並未前往滇西南，而是止步於大理府。張允隨此次巡閱使得「雲貴總督對滇黔兩省之巡閱成為定制」，同時也使「雲南邊疆之巡閱成為乾隆年間一項非常重要的邊備事務」（方國瑜 1998a：739；馬亞輝 2012：153）。接替張允隨任雲貴總督的碩色，於乾隆十七年（1752）巡閱滇西，並對「秤戛事件」做了最終處置，即將「界連數屬，錯雜難稽」的「秤戛各寨…剖劃疆界，分率管轄稽查，庶有責成」。從碩色所提及的怒江流域「秤戛各寨名稱」及其「分率之土職」來看，¹⁴除臨近麗江府蘭州土舍（習稱為兔峨土司，府署在今蘭坪縣）轄地的少數幾寨外，絕多數村寨皆位於今瀘水縣範圍之內。碩色以地處怒江東西岸為劃分標準，設置江東六庫、老窩土千總，率屬雲龍州及江西登埂、魯掌土千總、卯照土目，劃歸保山縣管轄，由此清王朝勢力逐步穩固於今怒江流域瀘水縣一帶。嘉慶二年（1797）怒江東岸的雲龍州知府及老窩、六庫土千總聯合西岸的登埂土千總，合力修築了溝通兩岸的驛道，商貿隨之日漸繁盛，漢人移民也自然接踵而來（怒江舊志 1998：152-3）。直至清末，對碩色處置「秤戛事件」之道，清王朝皆「未改焉」，此時秤戛已是怒江南部「熟傣」與北部「生傣」間一涇渭分明的界線（方國瑜 1998a：775；Forrest 1908：243-6）。

從民國時期的調查資料來看，民國元年瀘水縣五土司（六庫、老窩、登埂、卯照及魯掌）轄境內漢人人口數已超過傣人口數，分別為3421、2545人（怒江舊志 1998：22）。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因「其統治之土司頭目多系漢人」，瀘水縣一帶的傣「多能操漢語，儘量吸收漢人文化、婚喪、禮制，每喜仿漢人俗習」，學者稱之為「白傣」（張征東 2007：439-440）。至於福貢、貢山兩縣之「黑傣」，應是在清嘉慶維西「恒乍繃起義」之後，才大規模由維西、蘭坪翻越碧羅雪山遷徙而來，因「（清王朝

¹⁴ 請參閱 [清] 碩色《處置秤戛等隸奏摺》，見載于《雲南史料叢刊》第八卷，頁775-80。

在恒乍繃起義」之後)所委頭人、土官,俱系麼些族(即納西)選派」,故「其最愛吸收麼些族之文化」(同上引:439-440)。對於瀘水以西,騰沖、龍陵一帶之「花傣僳」,張征東雖提及「其與漢人雜處,宰官、頭目亦多漢人,與漢人關係比白傣僳尤為密切」(同上引:439-440),但觀其行文,已非如之前描述「白傣僳」、「黑傣僳」般,強調兩者效仿各自漢人、麼些土司頭目之俗習、文化,在張征東看來,「(花傣僳)生活每效仿漢人為標準」,更多是因其與漢人雜處。實際上在本文所指的滇西南地區,即今德宏州、保山市及臨滄市西部一帶,花傣僳的聚居形態呈現一致性,其聚落與漢人聚落雜處於高地,且往往位於中緬商貿往來的必經之路上,或臨近以漢人為主體的高地街市,或壩子街市。由現有的清代史料及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學者實地調查所搜集的資料來看,上述滇西南花傣僳聚居形態之形成,應與中央王朝的邊政息息相關。在乾隆朝「中緬之戰」後,清王朝在滇西南中緬邊界一帶,屬「擺夷」土司轄地的高地之佈防,多仰賴於漢人「撫夷」,此地花傣僳與漢人雜處,多源於受漢人撫夷招募,成為其轄下「弩手」之故。

「擺夷」土司轄地因「中緬之戰」所導致的無序,致使「野夷」較大規模遷徙,進入「熟夷」地界,開始「侵蝕」滇西南這一清王朝的「內部邊疆」

(Bello 2005: 306-7),以致成為嘉慶朝經營西南邊疆的一大阻礙。花傣僳再次為清王朝所倚重,受招為「屯戶」,駐守于「擺夷」土司轄地與滇西南門戶騰沖間的高地,助力清王朝經辦「野夷」。而至道光朝,因掌政流官欲效仿同鄉傅鼐在湖南苗鄉所設防務,¹⁵花傣僳又被招募為「卡練」,駐守在騰沖、龍陵兩縣境內,臨近漢人聚居之壩子的高地。由此在「秤戛事件」後,怒江瀘水、雲龍一帶的傣僳人逐漸經由騰沖北部高地,擴散至今德宏、龍陵及臨滄等地,形成現今傣僳人在滇西南的分佈局面,且形塑了自身足以別於怒江一帶傣僳人的社會文化,亦即二十世紀初以降,在眾多中英文文獻中所記載的「花傣僳」、「Flower Lisu」。

¹⁵ 請參閱[清]胡啟榮《騰越屯防記》,見載於《騰越廳志》卷十七藝文志記,頁300-301; [清]周澍《騰越邊防記》,見載於《騰越廳志》卷十七藝文志記,頁300。

三、「弩手」、「屯戶」及「卡練」

滇西南花傣僳以「熟夷」身份見載於清代史料中，應是始於嘉慶朝，但實際上，早在乾隆年間，其可能就已成為清王朝的「治理資源」，由怒江流域較大規模搬遷至騰沖北部高地。「秤戛事件」之後，清王朝開始料理明萬曆年間設置的，屬騰越廳所轄七「擺夷」土司境內「八關九隘」之漢人「撫夷」。曾助力清王朝經辦「秤戛事件」之撫夷，「均得授職世襲」，並「管理地方」；至於「未立功之撫夷，則如鄉約甲長，聽地方官撤換」。¹⁶乾隆十七年（1752），據碩色之奏摺，清王朝在騰越廳所屬之北部高地，即毗鄰保山、怒江的東北部山地至與緬甸交接的西北部山地，由東至西共設置了大塘隘土把總、明光隘土把總、茨竹寨土守備、滇灘隘土目及古勇隘土把總，授予其轄地，並使之直屬於騰越廳，而非交由土司管轄。由此形成了清王朝在騰越廳北部高地，由漢人土官督率「弩手」，自行管理轄地之邊防體系。在上述五土官之中，應屬西北部的古勇隘楊氏土把總勢力最大，其「管理弩手、卡練、土練一百五十名」。¹⁷根據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學者在騰沖西北部高地踏查所得資料，楊氏土把總所招募之「弩手」、「卡練」、「土練」，應有不少為花傣僳。如滇西南「聚居最早、最集中處之古永（勇）蔡家寨傣僳族口傳及家譜所載，其先輩約在十五代前由（瀘水）江頭移古永爬岩居住，有楊氏扶夷官招為練民」，並最終形成漢人、花傣僳「以河為界，分居高山壩子東西兩邊」之聚居形態（張瑛等 1987：16-7）。¹⁸

乾隆「中緬之戰」後，清王朝在「騰越以外萬仞等七關，並木邦、中山、杉木籠等處…設撫夷正、副二人，給以外委職銜頂帶，並與兵馬錢糧，

¹⁶ 請參閱《續雲南通志稿》卷九十九〈秩官志·土司三〉，頁5316

¹⁷ 請參閱《續雲南通志稿》卷九十九〈秩官志·土司三〉，頁5316。

¹⁸ 據《續雲南通志稿》載，在大塘隘土把總、明光隘土把總、茨竹寨土守備、滇灘隘土目及古勇隘土把總中，唯有古勇隘土把總除督率「弩手」外，還轄有「卡練」、「土練」。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花傣僳報導人所謂「練民」又過於含糊，難以推測所指為何，故在行文中，只認定「楊氏土把總所招募之『弩手』、『卡練』、『卡練』，應有不少為花傣僳」。但依下文所述，花傣僳應是主要充當古勇隘楊氏土把總轄下「弩手」。

按季支」。¹⁹由此騰越以西之中緬邊境一帶，由明萬曆年間沿襲而來，漸成「有名無實」之漢人撫夷又重新成為清王朝邊政的關鍵。「（每關每處撫夷由）州、協會遴承充…令該觀土司留心訪察…不惟彈壓野人，保護行旅，並可稽查內地民人私越關隘」。²⁰與之前騰越北部山地土把總、土守備相似，花傈僳應也是騰越西部中緬邊境，「擺夷」土司轄境內各撫夷的招募對象。據乾隆五十四年（1789）雲貴總督富綱之奏摺，²¹可知當時騰越廳西部高地各漢人撫夷所督率之「弩手」，皆非漢人。在富綱看來，「弩手本系土司所屬之人，而以漢人管領，恐有倚恃頂戴，挾制土司之弊」，因此對於「防查關隘」之撫夷，應「令土司于所屬土日內揀選承充，仍率騰越鎮州統轄」。在當時聚居此地區的主要「非漢人」群體之中，唯有花傈僳及「野人」習慣生活於高地。兩者之中，作為當時清王朝的「彈壓」對象，「野人」自然不可能會被招募為「弩手」，而以「善弩射」聞名的「栗栗」、「獐獐」，應是漢人撫夷招募「弩手」的必然選擇。²²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資料來看，可能早在「秤戛之亂」後，便有花傈僳經由騰冲古勇搬遷至上述中緬邊境，「擺夷」土司境內漢人撫夷轄區，即今盈江縣蘇典、支那鄉一帶（徐鴻寶等 1987：47）。另據清末李根源踏查所記，由漢人撫夷駐守，今屬盈江縣的四關一隘，即銅壁關、巨石關、萬仞關、神護關及芷那隘一帶山地，正為今漢人、傈僳人及景頗人雜居之分佈形態最為彰顯處。²³

¹⁹ 請參閱德宏史志資料第十二輯《〈明實錄〉〈清實錄〉有關的德宏史料選編》，頁184。

²⁰ 請參閱德宏史志資料第十二輯《〈明實錄〉〈清實錄〉有關的德宏史料選編》編，頁184。

²¹ 請參閱德宏史志資料第十二輯《〈明實錄〉〈清實錄〉有關的德宏史料選編》，頁173。

²² 在清代文獻中，「善弩射」可謂為「栗栗」、「獐獐」一「文化特性」。[乾隆]余慶遠《維西見聞錄》載「栗栗…粒食罄，遂執勁弩藥矢獵」；[嘉慶]《滇省夷人圖書》載「栗栗，即力些…善用弩，每令其婦負木的徑數寸前行，弩簇輒中，而人不傷」（揣振宇 2009：61）；[光緒]《騰越廳志》卷十五諸夷志種人二至三載「獐獐…善用弩，發無虛矢」。在民國時人記載中，傈僳因「善弩射」，往往被視為「好獵手」，並因此「受邀」，遷居在山地漢人聚落附近，以防後者受山林野獸侵擾。在臨滄市西南部花傈僳聚居處宣教的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宣教士看來，「當地人之所以允許花傈僳遷居至此，乃因善弩射的花傈僳可使之免受野象侵擾，為此當地掌權者，甚至免除花傈僳的稅負」（Cooke 1932: 11）。另滇西北中甸縣傈僳人也是因「善弩射」，得以遷居中甸。據《民國中甸縣誌稿》載，因「山深林密，虎豹為害，乃於乾隆年間由土普旺人向維西縣屬瀾滄江邊找來唐姓獵戶一家，其便遂繁衍於沿江一帶高山」（1939: 12）。

²³ 請參閱李根源《滇西兵要界務圖注卷一》，見載于《雲南史料叢刊》第十卷，頁772-76。在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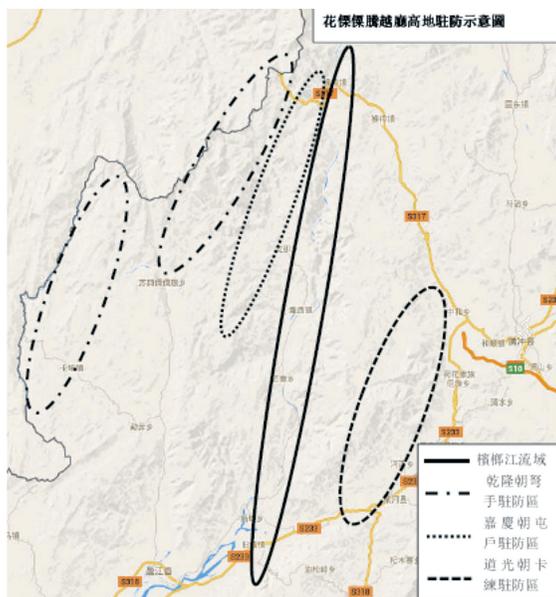


圖2 花傣僳騰越廳高地駐防示意圖（鍾鷺藝繪；底圖源於Google Maps）

嘉慶二十年（1815），時任雲貴總督伯麟在平定「野夷」動亂後，為防範「野夷」在「官兵陸續撤回後，不幹失業，複又潛回，佔據山箐險阻兼多地畝可墾」之處，上奏請求「招募波竜獐獐等項夷人往彼居住，撥給地畝墾種，令其自為守禦」。此次招募乃由流官「飭令」「擺夷」土司負責，所得「屯戶」也由其「嚴加管束」，在伯麟看來，「以屯為守，似可無虞」。²⁴由此滇西南花傣僳首次以「熟夷」身份見載於清代史料。據清末李根源踏查滇西邊境所記，²⁵伯麟此次經辦之「野夷」主要聚居于檳榔江中上游以西之高地，伯麟奏折中所稱「山箐險阻兼多地畝可墾」的「幫中山一帶」應屬今盈

國殖民者的記錄中，雲南傣僳人（Lisu, Yawyin, Liso, Lishaw）中，屬中緬邊境各關隘，商貿往來必經之路附近的傣僳人受漢人影響最深。「他們分佈於中緬邊境線兩側，位於中國一側者，通常聚居在漢人村落附近…且如漢人般，留有長辮」（Hertz 1912: 75），「講漢話、過中國年，並與山地漢人通婚」（Davies 1909: 392）。另今雲南學界多認為清朝文獻中滇西南「野夷」、「野人」，多指今景頗人先民，請參閱（景頗族簡史編寫組 1983：26-7）。

²⁴ 請參閱〔清〕伯麟〈奏為剿捕騰越州邊界野夷完竣官兵撤回歸伍酌籌抬屯設汛事宜等情事〉《宮中檔奏摺嘉慶朝》，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編號404018107；個人乃據Giersch引文（2006: 116），查找、獲致此史料。

²⁵ 請參閱李根源《滇西兵要界務圖注卷一》，見載于《雲南史料叢刊》第十卷，頁772-76。

江縣轄境，由此清王朝在滇西南「擺夷」土司轄地及重鎮騰冲間的高地構建了一隔絕「野夷」，由「熟夷屯守」之區域。

道光七年（1827），或因「野夷…數十年來呼朋引伴而至者，更難以數計」，²⁶以檳榔江為界設防已非萬全之計，又有三百七十戶花僮僮被掌政流官招募為騰越廳轄內之「卡練」：

署騰越廳廣裕詳情設立河西週邊香柏嶺十五卡，招募獠獠三百七十戶分駐。於鹽課餘，留半銀支給口糧鹽菜。限滿聽其種地守卡…不敷口糧。永昌府胡啟榮騰越廳周澍詳情奏明借藩庫銀兩萬兩置買練田，分給各獠獠口糧，府廳各捐銀一萬兩，三年歸款。²⁷

所謂「河西週邊香柏嶺十五卡」，應位於為李根源所稱蓋西大山之「山西」，²⁸即為今檳榔江以東，南底河以西，北至騰冲猴橋，南至盈江縣城之山地，現分屬騰冲、梁河、盈江三縣管轄。經咸同年間「杜文秀起義」，上述清王朝在滇西南高地所設邊防，大多廢棄，但花僮僮因被招募為「弩手」、「屯戶」、「卡練」，而分佈於滇西南之局面卻延續至今。在滇西南花僮僮的口傳及其家譜之中，皆有提及先輩最初乃從怒江瀘水一帶搬遷而來。但至民國時期，滇西南花僮僮已然相異于瀘水一帶之「白僮僮」。雖處以「擺夷」為主體族群的滇西南地區，但作為「弩手」、「屯戶」、「卡練」，花僮僮同漢人一道，聚居於高地，自然與「與漢人雜處」，且「與漢人關係比白僮僮族尤為密切」（張征東 2007：440）。在效仿周遭漢人的同時，花僮僮也在與漢人長期的頻繁互動之中，形塑著自身的族群認同。此種形塑之基

²⁶ 請參閱 [清] 胡啟榮《騰越屯防記》，見載於《騰越廳志》卷十七藝文志記，頁300-01。

²⁷ 此時原本任騰越廳同知的胡啟榮已累遷為永昌府太守，由周澍任騰越廳同知，就胡啟榮所著《碉堡圖說》來看，此次「獠獠」被招募為「卡練」，駐守在檳榔河以東，臨近騰越壩子之高地，應是其效仿同鄉付鼎在湖南苗疆的設防之道，在騰越「沿邊周圍二千數百里」高地「建碉堡七十七座、設屯練六百二十四名、置練田三千四百十九畝…授耕招佃，俾屯練永守」（道光《雲南通志稿》卷106〈邊防上〉），以防範野夷滋擾之邊政的一部分。

²⁸ 據李根源《滇西兵要界務圖注卷一》所載，「大盈之西名蓋西大山…山東之水入小梁江，山西之水入檳榔江，至幹崖匯合。山西為野人僮僮所居，同知胡啟榮沿邊設碉卡數十坐」（方國瑜 1998b: 772）。

點，便是關於自身如何成為「弩手」、「屯戶」、「卡練」之故事，其中以「上刀山下火海儀式」最為外界熟知。²⁹不同於史料中，以清王朝為中心之視角，滇西南花傣傣對自身如何成為清王朝的「治理資源」，有著自己另樣的「歷史記憶」，下節即是對此的呈現。基於田野工作所得資料，個人將以聚居於今保山市龍陵縣中西部的花傣傣為個案。此地為龍陵縣象達、平達、木城三鄉與德宏潞西縣中山鄉交界地帶，處高地，聚居於此之花傣傣及周遭漢人，皆稱之為「冷山」。不同於中緬邊境沿線的騰沖、德宏高地，交通滇西南「擺夷」土司轄地及滇西南重鎮永昌府（即今保山市）的龍陵縣並無邊防負擔。在流官治下，花傣傣聚居的冷山一帶關係其周遭平達壩子、滇西南商貿重鎮象達街漢人聚落的安定，³⁰其選擇在冷山一帶設置「卡練」，並招募花傣傣駐守，應是受時任永昌府太守胡啟榮，騰越廳同知周澍設防騰越沿邊之道的影響。

四、冷山花傣傣

與上述騰越廳轄境內一樣，花傣傣較大規模聚居在時屬龍陵廳的冷山一帶，也與清王朝所設「卡練」相關。以《龍陵縣誌》卷九〈武備志〉相關記載來看，龍陵廳冷山一帶「等穀、蘆根河及黃連河」三卡之設置時間，應與上述騰越廳「河西週邊香柏嶺十五卡」設置時間相近。而從現今「冷山三卡」一帶以花傣傣為主體的聚居形態來看，龍陵廳同知岳輝文與其騰越廳同僚一樣，皆是招募花傣傣以充當「卡練」。在《龍陵縣誌》卷六〈秩官志〉

²⁹ 「上刀杆下火海儀式」，只盛行於今怒江傣族自治州瀘水縣及保山、德宏一帶傣人間，可視為滇西南「花傣傣」多源于瀘水「白傣傣」的佐證之一。今以騰沖縣猴橋鎮所行「上刀杆下火海儀式」最為外界所知，請參閱熊迅（2010）。

³⁰ 平達壩子是龍陵縣面積較大，耕作條件較佳的壩子之一，屬漢人在龍陵較大規模的聚居地。象達與芒市、龍陵恰好組成一「三角形」，是人貨流通的重要中轉站。民國時期，象達已然成為滇西南紡織業重鎮。其西北之芒市屬滇西南各土司地，最為富饒者，而東北之龍陵則為怒江以西，除騰沖外，漢人的主要聚居處，設有海關，兩地對各類商品需求量較大，象達紡織品銷路可謂無憂。此外將緬甸棉紗由芒市運往象達，可避免在龍陵海關處報關，因此象達紡織品成本相對較低，其紡織業也得以興盛。據報導人回憶，由冷山前往象達趕街途中，印象最深者，即為由漢人村寨傳來的加工、縫製棉布之機杼聲。

中，岳輝文為官「處事精詳，為民達慮」，其設卡乃因「盜賊出沒」，而在設卡之後則「盜風頓息」。不同於《龍陵縣誌》以漢人為中心的視角，冷山花倮倮對自身如何成為清王朝的「治理資源」，有著自己的敘述：

在清王朝的勢力進入冷山之前，此帶的「倮倮族」並未形成任何有規模的山寨。冷山是一群「倮倮族匪徒」的勢力範圍，為首者為兩兄弟，人稱「楚大天尊」及「楚大天王」。當時平達壩子的漢人牧牛時，若稍有不慎，讓牛進入了「倮倮族匪徒」盤踞之處，因心存畏懼，他們往往會棄牛而不顧。此外眾「匪徒」自恃武功高強（在冷山花倮倮的口頭敘事中，他們輕功了得，是能「飛起來的」），常常至平達，侵擾此地的漢人。為平定「倮倮族匪徒」，龍陵縣衙的一位官員便偽裝成一名乞丐，穿著破蓑衣來此地打聽虛實。在探得「倮倮族匪徒」各人的名字後，官員便返回縣城，隨後遣人送來邀請，邀眾人春節時去縣城表演武藝。「倮倮族本就想法簡單」，「匪徒」便應邀前往縣城。在縣城時，他們受到了官員的熱情款待，在表演完自身武藝後，縣衙還給予了獎賞。回冷山前，官員邀請明年春節再來縣城表演，眾人又接受了邀請，並在第二年如約前行。此次在縣城的經歷與前一年相似，官員又邀請眾「匪徒」第三年春節也來縣城。第三年諸人又如約前往縣城，在「匪徒」表演完節目後，縣衙官員隨即宣佈要委眾人以重任，並且要發槍給他們。官員便要「匪徒」一個一個進入一間屋子，以便領取槍支。此時的「倮倮族匪徒」對官府已全無警惕之心，便照官員所言行事。不料縣衙官員早已在屋子裡布下陷阱，「匪徒」一進屋，便遭人由門後左右兩側突襲，以重錘擊打頭部，直至斃命。為避免屋內地板留下血跡，使得之後進屋的「匪徒」起疑，官員還令人在地板上鋪羊氈子，若有血跡滴落，便再換上新的羊氈子。如此眾「倮倮族匪徒」便一個接著一個被官員殺害，直至最後一名「匪徒」進入屋子時，官員明示此「匪徒」，他的同夥皆已被殺害，現在就剩他一人，縣

府要任他為把總，好好約束散居在冷山一帶的「傣傣族」。

（根據個人田野筆記整理）³¹

此位被官員任命為「把總」之人，便為今冷山一帶花傣傣口頭敘事中常常提及的「余四把總」。在此類口述中，余四把總乃眾「傣傣族匪徒」中「武功最差、最沒有本事的」。在個人搜集到的余氏家譜中，³²余氏一族約在嘉慶初期搬遷至冷山大碓河一帶，余四把總屬生活于冷山的余氏第三代人，其成長至足以擔當把總之年歲，應在道光年間（1820-1850），此與上文據《龍陵縣誌》之記載所推斷的「冷山三卡」設置時間相符，因此上述花傣傣之口頭敘事應是其關於自身如何成為「卡練」之故事。《龍陵縣誌》短短數語，並未明確指明誰為「盜賊」，但從上述花傣傣的口頭敘事、冷山一帶人口組成及當時清王朝在滇西南慣用的邊政來看，「盜賊」極有可能便為花傣傣。上述口頭敘事，乃花傣傣對清王朝經營滇西南邊疆之準則—「以夷治夷」—的歷史記憶。對冷山花傣傣來說，只有「心裡藏著七把鐮刀」的漢人，才能策劃延續週期如此之長的縝密計畫。此外在報導人看來，「漢族的狡猾之處還在於，他們故意讓武功最差、最沒本事的人擔當傣傣族頭人，在這樣一名頭人的統領下，傣傣族只能任由漢族欺壓」。

³¹ 個人於2013年9月至2103年11月，2014年1月至2014年9月在龍陵冷山石洞河傣傣聚落進行為期十二個月的田野工作，聚落內中年以上之村民大多熟稔此則口述史。報導人在講述時使用「匪徒」等貶義文字，顯然是受國家引導的社會演化論以及文化中心論的論述影響，內化而出現，但因是出自報導人之口，個人在此如實轉述。在冷山花傣傣的口頭敘述中，也有漢人借花傣傣不識漢字，巧立合約，尋機霸佔其在冷山梯田之事。故在冷山花傣傣眼中，漢人頗為「狡猾」、「心裡藏著七把鐮刀」。此外報導人口述時自稱傣傣族，而非傣傣，或傣傣人，系受現代中國族群構建話語體系之影響，轉述時仍以傣傣族稱之。

³² 此《余氏家譜》乃報導人自行以傣傣文所書而成，該報導人生於1920年，屬冷山一帶余氏第六代人，在其幫助下，個人已將之翻譯、整理成漢文版本留存。據此家譜，余氏先祖應在乾隆末年，因地震之故，而由騰沖明光搬遷至今龍陵縣黃草壩小米地一帶生息，育有四子。後四子中，除一子繼續於小米地一帶繁衍外，其餘三子皆外遷至他處。其中有二人搬遷至冷山一帶，一子至今象達鄉大碓河村，另一子則至今平達鄉安樂村。



圖3 龍陵縣冷山花傈僳聚居處示意圖（鍾鷺藝 繪；底圖源於Google Maps）

由此花傈僳開始大規模聚居於冷山一帶，並與其周遭之漢人互動。不同于騰沖古永花傈僳與漢人在「高山壩子以河為界，分居兩邊」之聚居形態。在聚居空間上，冷山花傈僳與漢人間，存在著更為明確的界限。冷山一帶雖也存在漢人聚落，³³但因山地壩子的缺乏，其與花傈僳聚居之處往往以山脈相隔，因此除些個案外，相較於聚居平達、象達壩子街市之漢人，其與冷山花傈僳之間的互動並未因同處山地而更趨頻繁。冷山一帶花傈僳與漢人間的族群互動應更接近於東南亞北部大陸的普遍情況，即山地族群與平地族群之間的族群互動。³⁴致力於此地區研究的人類學者對此已多有闡述，但其往往受以

³³ 與冷山一帶花傈僳互動最為頻繁之漢人聚落當屬以山脈相隔的猛蚌、猛堆，此兩漢人聚落也是因流官設置「卡練」之故，漸成規模，其設置時間稍晚于「冷山三卡」，乃由接替岳輝文擔任龍陵同知的宋淇所設（龍陵縣誌 1975：257）。

³⁴ 相較之下，乾隆朝時受漢人撫夷招募，駐守在中緬邊境沿線、「擺夷」土司轄境內之高地，及嘉慶、道光兩朝為防範「野夷」，受招為「屯戶」、「卡練」駐守在「擺夷」土司與騰越廳交界地帶之高地的花傈僳，因其周遭壩子的主體族群以「擺夷」為主，漢人作為移民，大多聚居於高地，花傈僳與漢人可謂同屬「山地族群」，其互動模式與冷山一帶相異。冷山一帶的漢人，因周遭平達、象達壩子已然存在主導人貨流通的街市，其既無須，也無力在山地形成街市，由此冷山一帶並不存在花傈僳與漢人固定的互動空間。相反聚居在中緬邊境沿線、「擺夷」土司轄境內及「擺夷」土司、騰越廳兩者交界地帶之高地的漢人移民不僅能在高地形成街市，其聚居處往往也是中緬商貿往來、人貨流通的必經之路。

「有／無…」來標示平地族群／山地族群之「二分法」影響一如有文字與無文字、種水稻與不種水稻、信仰佛教與不信仰佛教等一先不自覺呈現出兩者「相隔」之意象，再順勢將中央王朝、西方殖民勢力及民族國家的各式「文明化工程」(Civilizing Projects)視為平地、山地族群互動之基礎 (Tapp 1989; Wijeyewardene 1990; Harrell 1995; Pine 2002)，以便經由「國家史觀」書寫兩者間的族群互動史、區域史。³⁵實際上，滇西南平地、山地族群間人、物之「流動」不僅源於各式「文明化工程」，日常的互通有無才是兩者族群互動之基礎。³⁶十九世紀中葉以降，滇西南花傣僳較大規模遷居至今緬甸克欽邦、撣邦，及泰國北部，並最終奠定現今東南亞北部大陸傣僳人分佈之局面，便與此息息相關。

³⁵ 關於「國家史觀」之定義及論述，請參閱何翠萍、魏捷茲、黃淑莉（2011：80），其將「國家史觀」視為高地東南亞社會歷史研究的「潛文本（subtext）」。

³⁶ 在此僅以冷山花傣僳為個案呈現，希冀能以點窺面，敘述滇西南綿綿群山間，人、物的不斷「流動」。在冷山形成較大規模的聚居之勢後，花傣僳與冷山之外漢人間的族群互動也日趨頻繁。因生計所需，冷山花傣僳經常「流動」至漢人聚居之壩子，基於流動之性質，可將其歸為兩類：一是「偶然性流動」，此時期冷山周遭壩子的漢人富者在自家女兒出嫁時，往往會行「送親」儀式，旨在以展演形式，將自家女兒及其嫁妝送至新郎家中。因組織送親隊伍之需，他們便會雇傭冷山花傣僳以擔當送親隊伍的轎夫、挑夫及樂手。此外也有少數冷山花傣僳曾至漢人村寨，在富裕之家作長工，甚至遠赴緬甸，為漢人看養驛馬。另一類為週期性流動，即至壩子集市「趕街」，距冷山約有半日腳程的象達街，為花傣僳主要「趕街」處。因紡織業的興盛，象達與芒市、龍陵一道，成為此地區主要的貨物集散地，並與滇西南其它地區一樣，同設有以五天為週期的集市。花傣僳通常清早出發，將自製草席、底線（用於縫製草鞋底部）揹運至象達街販賣，在購得鹽、布等必需品後，于傍晚返回冷山。實際上花傣僳因買賣之故，與周遭漢人互動可謂由來已久。在石洞河人的口述史中，早在乾隆末年，余家由騰沖明光搬遷至龍陵黃草壩小米地時，便已依靠刀耕火種方式種植「粃子」，並將之賣予漢人，供其榨油。而自二十世紀初以降，英國經由緬甸八莫，將印度棉紗大量輸進滇西南，導致此地區紡織業日漸工業化之前，此地布料生產以小作坊製作的「土布」為主，在漢人主要聚居處，皆有專以染布為生之人。此時冷山花傣僳「找錢」方式之一，便是以刀耕火種之法，在坡地間種苦蕎、粃子及靛，並燒制靛漿，賣與漢人染布業者。後因價廉質優的工業織布大量充斥滇西南市場，「土布」漸無銷路，花傣僳遂無以為繼此種「找錢」方式，改以販賣自製草席、底線「找錢」。除與周遭漢人互動外，更有少數冷山花傣僳將買賣延伸至騰沖。據報導人回憶，二十世紀初時，已有花傣僳從冷山販運火炭（由火麻製作而成）到騰沖出售，在騰沖購得子安貝後，返回冷山販賣，以供花傣僳婦女裝飾自身服裝。

五、「守邊」與「流動」

明清時期，中央王朝日漸重視對滇西南中緬邊境一帶的經營，隨著邊防體系的逐步完善，滇西南以騰沖為核心，沿邊各汛、塘、關、隘為支點的商旅之道也日趨成熟。在擇選邊防將士駐紮之處時，物資輸送便利與否，顯然為考量重點之一，隨著邊防體系的逐步成熟，溝通各邊塞、邊塞與縣、廳、府間的交通網絡也更為便利，以「馬幫」為基礎的商旅之人自然接踵而來，³⁷為在綿綿群山間保證自身人貨安全，其通常選擇途徑中央王朝佈防之處。早在明代滇西南中緬交界地帶的商貿便堪稱熱絡，因皇室及權貴對寶石的追逐，明王朝在今雲南昆明及保山-騰沖派駐了「鎮守太監」，其主要職責之一便是設法獲得緬甸北部的寶石，以滿足北京、南京之皇室、權貴的需求。為獲得寶石，「鎮守太監」及其代理人頻繁流動于八莫-騰沖-保山之間，滇西南中緬交界地帶，逐漸形成以寶石為核心的商貿體系（Sun 2000: 134-153）。歷經清代近150年（1700-1850）快速的人口增長，滇西南的商貿體系日臻成熟，騰沖、保山日漸成為商賈雲集之「新型城鎮」（Lee 2002）。從乾隆末期起，因清王朝權貴對玉石的熱衷，使之從眾寶石中脫穎而出，成為中緬邊境寶石貿易的核心。³⁸此外鴉片、棉花等日常消費品，也作為主要商品，由緬甸流通至雲南（Chang 2011; Nugent 1982; Giersch 2011）。

³⁷ 因適應山路及耐勞性強，雲南騾馬為中國西南及東南亞北部陸路運輸的不二選擇（Chang 2014: 149），明清時期較大規模的人貨往來皆仰賴於「馬幫」。以騰沖為基點的中國商人所供之騾馬，在英國殖民者對中緬邊境一帶踏查中，起著關鍵作用。民國初年，供應英國殖民者踏查片馬一帶所需騾馬之商人，成為主政滇西，熱衷於民族國家之建設的李根源主要的懲戒對象（McGrath 2002: 86-88）。「二戰」時，雖有先進的現代交通工具承擔印度-西藏-雲南間的物資輸送，「馬幫」依舊不可或缺。

³⁸ 玉石貿易主要由廣東商人掌控，在「杜文秀起義」前，其通常經「八莫-騰沖-下關-昆明」之陸路將玉石運輸至昆明，再經滇東、廣西，最終到達廣東。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後，緬甸北部之玉石改由海路運輸至廣東。因玉石產地皆處克欽人（Kachin）聚居之處，其社會文化自然深受玉石貿易影響，雖處邊隅高山之中，但因玉石貿易之故，其頭人頗能與各方角色周旋，對外界局勢之變化也較為敏感。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玉石貿易達到高峰後，因「鴉片戰爭」的爆發，廣東商人不再至昆明購買玉石，中緬邊境一帶的玉石貿易陷入停滯，克欽頭人曾至曼德勒，以便由緬甸政權處打聽玉石貿易突然停滯的原因（Hertz 1912: 104-111）。以克欽人為中心，敘述因人、物之流動而造成的族群互動，及由此產生的對克欽人自身社會文化、族群認同的影響，請參閱Sadan（2013）。

因與行旅長久互動，邊防將士可謂為知曉「商機」之人，早在明王朝經營滇西南初期，其派駐邊塞之將士就開始兼任溝通中央王朝及東南亞北部的「貿易者」角色。此地區以「麓川」為首的「擺夷」政體之強盛，便與兼任「武器貿易者」的明王朝邊防將士相關。至十五世紀中葉，邊塞將士兼任「武器貿易者」已頗為常見。終明一朝，滇西南以駐防將士為主的越境「走私」貿易，堪稱是屢禁不止（Sun 2000: 35-36, 110-111）。清代「中緬之戰」後，清王朝在滇西南部署重兵，除防備緬甸侵擾外，眾多綠營將士還是清王朝實施兩關鍵邊政之基石，其營地皆擇選既臨近騰沖、龍陵，又為兩地進入各「擺夷」土司地之要害處。為貫徹「以夷治夷」政策，清王朝嚴禁「內地人在夷地開鋪及與擺夷婚」，並劃定期限，令「永昌、騰越人」將在「擺夷」各土司地所典得的土地歸還原主。保證禁令的順利施行，即為扼守「漢人擺夷交界處」之綠營將士的一大職責。此外為以示懲戒，清王朝還禁止境內住民與緬甸通商，為嚴查出入，綠營將士每年皆於秋後由營地出防，分路駐紮於中緬邊境沿線各山間關隘，並在夏初瘴氣氾濫前撤回。³⁹此時滇西南各「擺夷」土司、漢人撫夷乃為綠營將士之補充，因分別定居於綠營營地、山間關隘附近，「擺夷」土司自然主要助力于上述清王朝的首項邊政，而在綠營將士夏初撤防回營後，在各關隘嚴查出入，便為各漢人撫夷的主要職責。在緬甸政權願意重新遣使進京朝貢後，清王朝遂廢除與緬甸通商之禁令，並撤防減汛，漢人撫夷遂成為清王朝在中緬邊境各山間關隘的主要佈防力量，以保護中緬間的商旅往來。作為各漢人撫夷轄下「弩手」的花傣，自然受商旅往來影響，成為知曉「商機」之人。此外嘉慶、道光兩朝受招為「屯戶」、「卡練」駐守在滇西南高地的花傣，或因周遭同為「山地族群」的漢人大規模定居之勢，而在高地形成街市；或因其駐守處本就臨近壩子街市，更是通達「商訊」。由此滇西南花傣得以借助十九世紀中葉以降，日漸興盛的鴉片貿易，再次主動選擇遷居之處。

³⁹ 請參閱德宏史志資料第十二輯《〈明實錄〉〈清實錄〉有關的德宏史料選編》，頁183。

「杜文秀起義」後，鴉片貿易日漸成為左右中緬交界地帶政經局勢的主要因素。因多聚居於適宜種植鴉片的高海拔山地，花傣傣的社會文化受之影響，可謂深遠，從十九世紀中葉起，陸續有滇西南花傣傣遷移至今緬甸克欽邦、撣邦，及泰國北部，奠定了現今東南亞北部傣傣人分佈之局面。在 Gillogly (2006: 91-93) 看來，尋找更適宜的鴉片種植地正是花傣傣選擇在此時期主動南遷的主要原因。⁴⁰十九世紀中葉起，相較於滇西南不平穩的政經局勢，緬甸北部、泰國北部顯得較為太平，其與滇西南花傣傣聚居處相似的生態，稀疏的人口分佈，以及西方殖民勢力統治下較為穩定的政經局勢，使之成為頗具吸引力的遷徙目的地，鴉片貿易的興盛恰好使得花傣傣堅定遷徙的決心。因鴉片種植，花傣傣具備足夠的川資，以支付代價不菲的遷徙；遷徙地眾多待未開墾的高山森林，也使得鴉片種植的前景可待。如其所言，此時期傣傣人南遷緬甸、泰國山區並不是源于「崇尚自由」，事實上此時期南遷者，以滇西南花傣傣為主，相較于白傣傣、黑傣傣，花傣傣受漢人影響最深。時人所謂傣傣中的「崇尚自由者」皆指怒江瀘水以北的黑傣傣，如上文所言，滇西南花傣傣可謂為清王朝的「治理資源」，而並非「不願被治理者」，其遷徙更不屬「避免被治理的技藝之一」（Scott 2009）。正是作為清王朝的「治理資源」，扼守於中緬邊境商旅往來之道，花傣傣才得以知曉各類訊息，瞭解潛在的遷徙目的地之概況，遷徙路線及可能的維生之道。

Gillogly認為，搬遷至緬甸、泰國後的傣傣人，「依然如之前在雲南般，選擇既方便至集市貿易，又可不受外界政權侵擾之偏遠山地聚居」（2006：94）。其研究基本仰賴英文文獻，因此對雲南傣傣人聚居情況的瞭解主要源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親歷此處之人所作記錄。此類英文著述之著者履步滇西，往往與「踏查」、「探險」相關，觀其行徑，皆是經由緬北重鎮八莫進入雲南，沿商道穿過滇西南花傣傣聚居之高地，至騰沖休整，再北上至怒江上游（秤戛以北）「黑傣傣」聚居處。加之其描述見聞時通常不會特意指明對像是「花傣傣」還是「黑傣傣」，而是皆冠以Lisu (Yawyin)、Liso、

⁴⁰ 基於英國殖民者所記載的花傣傣遷居緬甸境內的相關情況，Gillogly已對此論斷作出了令人信服的闡述，詳見（2006：93-99）。

Lishaw之名。因此行文中將滇西南花傣聚居處臨近商道、街市之狀況，與因「踏查」、「探險」之故，有意渲染的怒江上游「黑傣之野蠻、不受治理」之特點，皆安放在雲南傣人名下（Forrest 1908; Rose and Brown 1910; Fraser 1922），由此導致Gillooly對雲南傣人擇居特點之誤解。實際上就滇西南花傣而言，其的確聚居於「方便至集市貿易」之處，但「不受外界政權侵擾」卻非其擇居特點。如上節所述，清王朝邊政是形成現今滇西南花傣分佈狀況的肇因之一。就此地區花傣的「大本營」，即今滇西南中緬邊境，原屬「擺夷」土司轄境內的高地的情況而言，花傣並非「不受外界政權侵擾」，反倒是受命於漢人撫夷，與漢人毗鄰而居，並與周遭漢人一起，在漢人撫夷統率下，承擔保護來往商旅之責。對於二十世紀初，滇西南以「八莫-騰冲」為核心的商貿路線，英國駐騰冲海關官員有著詳實的記載。其中密支那至古永、盞達兩條商道，皆有花傣聚落佔據中緬邊境高地之緊要處，在「杜文秀起義」前，兩處應分屬古永隘、銅壁關漢人撫夷之勢力範圍（Fletcher 1919: 11-13）。⁴¹此外滇西南花傣作為「屯戶」、「卡練」駐防的，更臨近「擺夷」壩子、漢人壩子的高地，也存在以漢人移民為主體的大規模聚落，並設有街市，形成中緬商貿往來的中轉站。因受招募，充當漢人撫夷轄下「弩手」，防範「野夷」滋擾的「屯戶」、「卡練」，滇西南花傣得以聚居於「方便至集市貿易」處，受益于「商機」頗多，自然將其在滇西南聚居於「商旅往來之道」之擇居特點延續至緬甸、泰國。至於遷居緬甸、泰國後的傣人聚居處之所以呈現出「不受外界政權侵擾」之擇居特點，應是遷居處地廣人稀，且被視為國家主體的平地族群尚未較大規模定居於高地之故。

六、結語

長期以來，西方人類學界皆視傣人為東南亞山地族群中的典型，塑造其「不願被治理」之族群標籤。此類「話語」（Discourse）最初可追溯

⁴¹ 請參閱李根源《滇西兵要界務圖注卷一》，見載于《雲南史料叢刊》第十卷，頁772-76。

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親歷者對怒江北部傣僳人「野蠻、不受管制」之刻板印象的強調。之後西方基督宗教宣教士基於自身體認，並因宣教事業之需，在以西方基督宗教徒為主要讀者的出版物中，強化了傣僳人在英文出版物中「自由的野蠻人」之形象（Conrad 1989）。加之二十世紀後半葉以降，人類學界選擇傣僳人為研究對象者，皆以泰國北部傣僳人為主，因為「新來者」，此地傣僳人「以家戶為單位、刀耕火種、種植鴉片」等社會文化特性，與之前探險者、旅行者、宣教士對中國、緬甸境內傣僳人的刻畫相吻合，由此延續了傣僳人「追求自由」之形象。其中以Scott (2009: 234-5)的研究最為「典型」，基於對Hjorleifur Jonsson之論述的簡單引用—「他們從不定位自己，選擇徹底遺忘自身的歷史，由此在宗教儀式、社會組織及其他能動員群體成員意願、勞力及資源的組織中，皆無超家戶組織的存在」—Scott便視傣僳人為Zomia區域典型的山地族群，屬「極致的水母型文化」，最擅「不被治理之技藝」。實際上Jonsson所稱之傣僳人僅指泰北之傣僳人，屬東南亞北部大陸傣僳人中之少數者，其社會文化難稱為傣僳人中之典型。此外遷居泰北傣僳人中占多數者乃滇西南花傣僳，如本文之論述所示，其可謂是擅於「被治理之技藝」。面對延伸至帝國邊陲的中央王朝，滇西南花傣僳能利用自身在中央王朝籌邊體系中身份的變化，成為其「治理資源」。而在中央王朝無力維繫自身在邊陲的統治，加之西方殖民勢力的到來，使得滇西南「多國邊地」(Aldelman and Aron 1999)之現實日益彰顯時，滇西南花傣僳依舊能遊刃於政治經濟體系之中，「用腳來投票」，流動於東南亞北部大陸的綿綿群山間，選擇最適宜「治理」自己的「治理者」，並最終在泰北形成現今最為西方學界所熟知的傣僳人社會文化。

如何翠萍、魏捷茲及黃淑莉一文所言，Scott之著述「全書都以大而化之的手筆來敘述任何的民族志細節或歷史」（2011：87），作為一政治學學者，其對所謂Zomia地區內各族群的社會文化或歷史之瞭解堪稱片面。實際上，Scott將早有大規模漢人遷居的中國西南視為Zomia一部分，本就難稱合理，自清乾隆以降，中國西南就不再是「國家權力難以到達的地方」（上引文：86）。就本文之研究而言，在漢人移民也為山地族群的滇西南，花傣僳

與漢人皆為「國家權力」之代理，因此得以較大規模聚居於高地，並形成中緬貿易往來之商道。而在整個東南亞北部大陸，山地族群受平地族群的影響之大，也絕不僅限於由平地族群主導的政治經濟體系。在看似對立的政治經濟地位背後，實則存在著許多共通之處（Leach 1970; O'connor 1996; Gros 2007; 何翠萍2011）。造就此類共通之處的，除了中央王朝、西方殖民勢力及民族國家的各式「文明化工程」外，更為重要的是基於貿易這一「更具影響而無孔不入的力量」之上的族群互動（何翠萍、魏捷茲、黃淑莉2011：95）。若以此地區眾多族群為中心，建構各族群社會文化，或書寫區域史，便可發現，東南亞北部大陸各式流動的人、物實為各式「文明化工程」及貿易引發的族群互動之基礎（Hill 1998; Sun 2000; Lee 2002; Davis 2003 ; Giersch 2006; Herman 2007; Tagliacozzo and Chang 2011; Sadan 2013）。借助「流動」之視角，有助於「不再將歷史做為一種像船一樣，是他處到來的外來之物」（Ortner 1984: 143），以便真正將東南亞北部大陸各族群視為能動者，從而達致對「國家史觀」的超越。

參考書目

尤中 Youzhong

1986 元明清時期的納西族和傣族 yuan ming qing shiqi de naxizu he lisuzu [Naxi and Lisu of Yuan Ming Qing]。雲南社會科學 yunnan shehui kexue [Yunnan Social Science] (3): 61-65。

方國瑜 主編 Fang, Kuo-yu, ed.

1998a 雲南史料叢刊第八卷 yunnan shiliao congan dibajuan [Historical sources for Yunnan, Vol.8]。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 kunming: yunnan daxue chubanshe [Kunming: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1998b 雲南史料叢刊第十卷 yunnan shiliao congan dishijuan [Historical sources for Yunnan, Vol.10]。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 kunming: yunnan daxue chubanshe [Kunming: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江應梁 Chiang, Ying-liang

2003 滇西擺夷之現實生活 dianxi baiyi zhi xianshi shenghuo [The life of Dai of west Yunnan]。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 dehong: dehong minzu chubanshe [Dehong: Dehong Minzu Press]。

民國中甸縣誌稿 *minguo zhongdian xianzhigao*

1939 民國中甸縣誌稿 *minguo zhongdian xianzhigao*。段綬滋 纂修
duanshouzi zuanxiu, 鳳凰出版社：中國地方誌集成雲南府志輯83
fenghuang chubanshe: zhongguo difangzhi jicheng yunnanfuzhi ji83。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辦公室編 *quanguo renmin daibiaodahui minzu
weiyuanhui bangongshi bian*[Office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 ed]

1957 雲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社會概況傈僳、怒、勒墨族調查資料之一
*yunnansheng nujiang lisuzu zizhizhou shehui gaikuang lisu, nu, lemozu
diaocha zhiliao zhiyi (shang, xia ce)* [Survey data of Lisu, Nu and Lemo,
Nujiang, Yunnan Vol.1]。

何翠萍 Ho, Ts'ui-p'ing

2011 人與家屋：從中國西南幾個族群的例子談起 *ren yu jiauwu: cong
zhongguo xinan jige zuqun di lizi tanqi* [Person and house: examples
from several ethnic groups in southwest China]。刊於[In]區域社會
與地方社會 *quyu shehui yu difang shehui* [Regional studies and local
societies]，張江華、張佩國編 *zhangjianghua、zhangpeiguo bian*
[Zhang, Jianghua and Peiguo Zhang, eds.], 頁296-342 [Pp. 296-342].
上海：學林出版社 *shanghai: xuelin chubanshe* [Shanghai: Xuelin
Publishing Co.]。

何翠萍 Ho, Ts'ui-p'ing、魏捷茲 James R. Wilkerson、黃淑莉 Huang, Shu-Li

2011 論James Scott高地東南亞新命名Zomia的意義與未來 *lun James Scott
gaodi dongnanya xin mingming Zomia de yiyi yu weilai* [Discussion
the significance and future about the newly named Zomia of highlands
southeast asia by James Scott]。歷史人類學學刊 *lishi renleixue xuekan*
[Journal of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9(1): 77-100。

余向有 撰、口譯；鍾鷺藝 整理 *Yu, xiangyou zhuan, kouyi; Zhong luyi zhengli*

2014 龍陵余氏家譜（傈僳族） *longling yushi jiapu (lisu zu)*。未出版
[unpublished]。

余慶遠（清） *Yu, Ching-Yuan (Qing Dynasty)*

1985 維西見聞紀 *weixi jianwen ji*。北京：中華書局 *beijing: zhonghuashuju*
[Beijing: Chung Hwa Book Co.]。

怒江舊志 *Nujiang old gazetteer*

1998 怒江舊志 *nujiang jiuzhi* [Nujiang old gazetteer]。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怒江舊志辦公室 *nujiang lisuzu zizhizhu: nujiang jiuzhi bangongshi*
[Nujiang: Office of Nujiang old gazetteer]。

高志英 *Kao, Chih-ying*

2007 流動的文化和文化的流動：唐代以來傈僳族的遷徙及其文化變遷研究

liudong de wenhua he wenhua de liudong: tangdai yilai lisuzu de qianxi jiqi wenhua bianqian yanjiu [Mobile culture and the flow of culture: a study of the migration of the Lisu and the change of their culture]。學術探索 xueshu tansuo [Academic Exploration] 3: 117-121。

張泓（清）Chang, Hong (Qing Dynasty)

1985 滇南新語 diannan xinyu。北京：中華書局 beijing: zhonghuashuju [Beijing: Chung Hwa Book Co.]。

張征東 Chang, Cheng-tung

2007[1945] 傈僳族社會歷史調查lisuzu shehui lishi diaocha [Research of Lisu's society and history]。刊於[In]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物志 nujiang lisuzu zizhizhou wenwuzhi, 頁426-526 [Pp. 426-526]。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 kunming: yunnan daxue chubanshe [Kunming: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張瑛等 Chang, Ying, et al.

1987 騰冲縣古永區蔡家寨傈僳族社會歷史情況調查tengchongxian guyongqu caijiazhai lisuzu shehui lishi qingkuang diaocha [Research of Lisu's society and history, Caijiazhai, Guyong, Tengchong Country]。刊于[In]雲南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彙編第二冊 yunnan shaoshuminzu shehui lishi diaocha huibian dierce [Bulletin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of Yunnan national minority, Vol.2], 雲南省編輯組, 頁16-32。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kunming: yunnan daxue chubanshe [Kunming: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徐鴻寶等 Hsu, Hung-pao, et al.

1987 盈江縣蘇典傈僳族調查報告 yingjiangxian sudian lisuzu diaocha baogao [Research of Lisu of Sudian, Yingjiang Country]刊于[In]雲南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彙編第二冊 yunnan shaoshuminzu shehui lishi diaocha huibian dierce [Bulletin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of Yunnan national minority, Vol.2], 雲南省編輯組 yunnansheng bianjizu [edit group of Yunnan], 頁46-70。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kunming: yunnan daxue chubanshe [Kunming: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雲南通志稿 yunnan tongzhigao

[年代不詳][n.d.] 雲南通志稿 yunnan tongzhigao。清 qing[Qing Dynasty] 道光十五年 daoguang shiwunian (1835) 阮元等修 ruanyuan dengxiu, 王崧等纂 wangsong dengzhuan。

傈僳族簡史 lisuzu jianshi [History of Lisu]

1983 傈僳族簡史 lisuzu jianshi [History of Lisu], 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kunming: yunnan renmin chubanshe [Kunming: Yunnan People Publishing Co.]。

揣振宇 主編 Ch'uai, Chen-yu, ed.

2009 滇省夷人圖說滇省輿地圖說 diansheng yiren tushu diansheng yudi tushuo.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Co.]。

滇志 dianzhi

1991 滇志 dianzhi. 明 ming[Ming Dynasty] 天啟 tianqi 劉文征撰 liuwenzheng zhuan. 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 kunming: Yunnan jiaoyu chubanshe [Kunming: Yun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Co.]。

樊綽 (唐) Fan, Cho(Tang Dynasty)

1962 蠻書 manshu. 北京：中華書局 beijing: zhonghuashuju [Beijing: Chung Hwa Book Co.]。

熊迅 Hsiung, Hsun

2010 儀式結構與國家認同：跨越中緬邊境的傈僳族刀杆節 yishi jieyou yu guojia renting: kuayue zhongmian bianjing de lisuzu daoganjie [Ritual contracture and nation identity: *Daoganjie* of Lisu living in the borderland of China and Burma]。西南民族大學學報 xinan minzudaxue xuebao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2: 45-50。

德宏史志編委會辦公室 編 dehong shizhi bianweihui bangongshi, ed.

1989 德宏史志資料第十二輯 dehong shizhi ziliao dishierji [Historical sources for Dehong Vol.12]。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 dehong: dehongminzuchubanshe [Dehong Minzu Press]。

龍陵縣誌 longling xianzhi [longling County Gazetteer]

1975 龍陵縣誌 longling xianzhi [longling County Gazetteer]。張鑑安修 zhangjianan, revised, 寸曉亭等纂 cunxiaoting deng, eds. 臺北：成文出版社 taibei[Taipei]: chengwenchubanshe]。

騰越廳志 tengyue tingzhi [tengyue ting Gazetteer]

1967 騰越廳志 tengyue tingzhi [tengyue ting Gazetteer]。清 qing[Qing Dynasty] 陳宗海修 chenzonghai, revised, 趙端禮纂 zhaoduanli, ed. 臺北：成文出版社 taibei[Taipei]: chengwenchubanshe。

續雲南通志稿 xuyunnan tongzhigao

1966 光緒續雲南通志稿 guangxuyunnan tongzhigao [Yunnan Gazetteer of Emperor Guangxu's reign]。清 qing[Qing Dynasty] 王文韶修 wangwenshao, revised, 唐炯纂 tangjiong, ed. 臺北：文海出版社 taibei[Taipei]: wenhaichubanshe。

Aldelman, Jeremy and Stephen Aron

1999 From Borderlands to Borders: Empires, Nation- States, and the Peoples in Between in North American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2): 814-841.

Bello, David A.

- 2005 To Go Where No Han Could Go for Long: Malaria and the Qing Construction of Ethnic Administrative Space in Frontier Yunnan. *Modern China* 31(3): 283-317.

Bradley, David

- 2004 Endangered Central Ngwi Languages of Northwestern Yunn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Lund, Sweden, 1-3 October.
- 2006 *Southern Lisu Dictionary*. Berkeley: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hang, Wen-Chin

- 2011 From a Shiji Episode to the Forbidden Jade Trade during the Socialist Regime in Burma. In *Chinese Circulations: Capital, Commodities, and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Tagliacozzo and Chang, eds. Pp. 455-479.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2014 *Beyond Borders: Stories of Yunnanese Chinese Migrant of Burm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nrad, Yves

- 1989 Lisu Identity in Northern Thailand: A Problematique for Anthropology. In *Hill Tribes Today: Problems in Change*. McKinnon and Vienne, eds. Pp. 191-121. Bangkok: White Lotus-Orstrom.

Cooke, Leila R.

- 1932 *Honey Two of Lisu-land*.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Davies, H. R.

- 1909 *Yü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vis, Sara

- 2003 Premodern Flows in Postmodern China: Globalization and the Sipsongpanna Tais. *Modern China* 29(2): 176-203.

Fletcher, H. G.

- 1919 Notes on trade routes in western Yunnan.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Forrest, George.

- 1908 Journey on Upper Salwin, October-December, 1905.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32 (3): 239-266.

Fraser, James O.

- 1922 *Handbook of the Lisu (Yawyin) Language*. Rangoon: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Burma.

Giersch, Charles Patterson

2006 *Asian Borderlan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 Yunnan Fronti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Cotton, Copper, and Caravans: Trad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west China*. In *Chinese Circulations: Capital, Commodities, and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Tagliacozzo and Chang, eds. Pp.37-61.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Gillogly, Kathleen A.

2006 *Transformations of Lisu Social Structure under Opium Control and Watershed Conservation in Northern Thailand*.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Gros, Stéphane

2007 *The Missing Share: The Ritual Language of Sharing as a 'Total Social Fact' in the Eastern Himalayas (Northwest Yunnan, China)*. In *Social Dynamics in the Highlands of Southeast Asia: Reconsidering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by E. R. Leach. Robinne and Sadan, eds. Pp.257-282. Boston: Leiden.

Herman, John E.

1997 *Empire in the Southwest: Early Qing Reforms to the Native Chieftain Syste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1): 47-74.

2007 *Amid the clouds and mist: 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17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rell, Stevan (ed).

1995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Hertz, W.A.

1912 *Myitkyina District*. *Burma Gazetteer*. Rangoon: 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Burma.

Hill, Ann Maxwell

1998 *Merchants and migrants: Ethnicity and trade among Yunnanes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Southeast Asia Studies.

Hostetler, Laura

1995 *Chinese Ethnograph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iao Albums of Guizhou Province*.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Leach, E. R

1970[1954]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Boston: Beacon Press. Lee,

James Z.

Lee, James Z

200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Frontier: Southwest China, 1250-185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cGrath, Thomas Eugene

2002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Foreign Relations in China: Yunnan Province and the Western Power, 1910-1937*. Ph.D.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Nugent, David

1982 *Closed Systems and Contradiction: The Kachin In and Out of History*. *Man* 17(3): 508-527.

O'connor, Richard A.

1996 *Blessings and Merit: Elementary Forms and Religious Complexes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Merit and Blessing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Kammerer Cornelia A. and Nicola Tannenaum, eds. Pp. 212-230. Yale Southeast Asia Studies.

Ortner, Sherry B.

1984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6(1): 126-166.

Pine, Judith M.S.

2002 *Lahu Writing and Writing Lahu: an Inquiry into the Value of Literacy*,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Rose, Archibald and J. Coggin Brown

1910 *Lisu (Yayin) tribes of the Burma-China frontier*. Calcutta :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Sadan, Mandy

2013 *Being and Becoming Kachin : Histories Beyond the State in the Borderworlds of Burm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British Academy

Scott, James C.

2009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un, Laichen

2000 *Ming-Southeast Asian Overland Interactions, 1368-1644*.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agliacozzo, Eric and Chang Wen-Chin, eds

2011 *Chinese Circulations: Capital, Commodities, and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Tapp, Nicholas

1989 The Impact of Missionary Christianity Upon Marginalized Ethnic Minorities: The Case of the Mong,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X(1): 70-95.

Wijeyewardene, G., ed.

1990 Ethnic groups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鍾鷺藝

廈門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系

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南路422號

zhongluyizly@gmail.com

Roaming Among the Cold Mountains:

The Impact of the Central Reign's Frontier Policies on the Migr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Flower Lisu, Southwest Yunnan, China (1735-1911)

Lu-yi, Zhong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 Ethnology
Xiamen University*

From 1735 to 1850, facing the extended control of Qing dynasty into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 the Flower Lisu made themselves the Qing's "ruled resources" rather than the target of imperial force. Furthermore, after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1850-1911), when the Qing's inability to sustain its rule in the periphery and the arrival of the Western colonial powers increasingly accentuated the "multinational frontier" aspect of Southwest Yunnan, the Flower Lisu were still able to maneuver their way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by choosing the most suitable "ruler" for themselves.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lineate how the Flower Lisu became part of the empire as the Qing borderland ethnic policy changed over time. In addition, the oral history obtained by field work provides a complementary emic perspective regarding the way of Flower Lisu are constructing their own historical memory of being part of the Qing's "ruled resources." Finally, the discussion further extends to how the Flower Lisu's migration to Burma's Kachin State, Shan State, and Northern Thail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choice of being part of the Qing's force.

Keywords : Flower Lisu, Southwest Yunnan, Qing, frontier policies, ethnohistory
